

黄运基《异乡三部曲》中的唐人街叙事与“家国”“异乡”协商

李保杰¹, 胡君卉²

(1.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山东 淄博 255035)

摘要: 美华作家黄运基的《异乡三部曲》以旧金山唐人街为书写对象,多视角呈现了一个半世纪中华人在美国的历程,在历史视域下对华人的美国梦进行再审视。这种基于唐人街人文地理风貌、融合华人移民历史与个体经验的唐人街叙事,呈现了以华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为代表的唐人街人文生态。小说在展现这种族裔文化特质的同时,还通过唐人街新一代华人的政治成长以及主人公与非裔好友的共同经历,强调华人必须克服唐人街思维、走出心理上的“唐人街”,在作为华人“家国”象征的唐人街和“异乡”象征的他族社区之间达成和解,从而在族裔共同体的合力之下真正实现“美国梦”。

关键词: 黄运基;《异乡三部曲》;唐人街叙事;族裔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5-0123-08

收稿日期: 2024-07-10

基金项目: 山东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7BWWJ02):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华工海外流散的文学叙事研究。

作者简介: 1. 李保杰(1972-),女,山东临清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2. 胡君卉(1987-),女,山东淄博人,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翻译硕士。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定居美国的黄运基(1932-2012),其作品被誉为美华文学^①的一座丰碑。黄运基出生在广东华侨世家,15岁移民到美国,靠自学成为华人社区中知名的媒体人和作家,先后创办了《时代报》(1972)和文学报纸《美华文化人报》,积极推进美华文学的传播和发展。作为“草根”知识分子,黄运基关注普通华人^②,在文学作品中着重书写这一群体的经历,这是因为社区普通“打工者”更集中地反映了自十九世纪中期契约华工赴美以来华人在美国的普遍生存境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黄运基更是亲身体会到了华人先辈曾经的凄苦——他一度因亲共政治立场受到美国非美委员会的调查并蒙冤入狱,他的长篇小说《奔流》的手稿也被没收,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小说方才发表。^③

《奔流》(1996)是黄运基的代表作《异乡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是《狂潮》(2003)和《巨浪》(2012)。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通过人物的历程将唐人街的百年历史画卷铺展开来,可谓美华文学“唐人街叙事”的一个典型。“唐人街”不仅是地理概念,还被视为华人文化的阈限空间,具有多重价值隐喻,“指向着一种文化价值、种族认同与精神坐标”^④。唐人街叙事聚焦唐人街人文地理风貌和历史变迁,投射出华人社区的双重影像——华人文化特质以及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投射。学界已经认可这种叙事对于重构华人历

①根据刘登翰等学者的说法,“美华文学”指“美国华文文学”,就是“旅居于美国的华侨、华人用华文(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参见刘登翰:《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同样,陈涵平和吴奕琦将“美华文学”当作“北美新华文文学”的简称,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一脉”。参见陈涵平、吴奕琦:《美华文学中的文化意象初探》,载《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但是也有学者将“美华文学”定义为更为宽泛的美国华人华裔文学,例如林润在《比较文学的一个新领域——美华文学研究》一文中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但是将汤亭亭等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此概念不仅限于华文文学。参见林润:《比较文学的一个新领域——美华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②黄运基在小说中有时交替使用“华侨”和“华人”两个词,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海外华人是否加入外国国籍,因此,除非特别强调,文中一般使用“华人”来泛指侨居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华人及后裔。

③[美]黄运基:《奔流》,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年,第285-86页。

④刘桂茹:《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学术界》2008年第6期。

史的作用,即“通过回溯、书写和重构,让历史的真相得以再现,填补了早期华裔移民史的空白”^①。黄运基的三部曲便是如此,它描写唐人街的人文地理风貌,通过“小人物”的经历,再现华人移民美国的“大历史”:主要人物余念祖的经历和认知经验将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加以延展,使被叙述时间(narrated time)从十九世纪苦力华工赴美淘金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总统访华,呈现唐人街百余年间的历史沧桑。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宏伟壮阔,刘荒田盛赞其“构成了从被囚于天使岛移民拘留所起步的近百年北美华人命运长卷”^②。

学界已关注到“唐人街”相关的文学书写,但是已有研究要么聚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盆景”^③的唐人街,探讨它如何深受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宰治并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要么分析新一代华裔“冲破唐人街与主流社会的隔阂”^④以及他们逃离唐人街的愿望。即便有学者历时考察华裔人物和唐人街的动态关系,如从“逃离唐人街”到“回归唐人街”的历程^⑤,也是以赵健秀等更加知名的作家为案例。而黄运基作品研究中,学界较多关注小说的宏大叙事,认为作者“擅长于新闻事件和宏大场面的叙事,(具有)对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精辟分析和驾驭能力”^⑥。虽有学者对黄运基的唐人街叙事进行过讨论,指出其“草根文学”取向及其特有的情感表达:“这批底层文本承载了草根移民群体的多重情感向度,写实性地彰显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悲欢离合以及关于生存与命运的种种苦难遭遇”^⑦。但学界对于三部曲在唐人街书写中的某些特质却关注不足。

三部曲并没有书写新一代华人逃离唐人街。相反,余念祖服兵役、参加民权运动,最终回到了唐人街;同样,就读于名校的胡小慧也回归唐人街,积极推进唐人街的文化项目,最终当选市议员并继续为唐人街的权利而努力。此外,余念祖有个如影随形的黑人挚友占美,他们不仅是同窗好友,而且还一起入伍、在部队中并肩作战;他们一起离开旧金山到南方参加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在麦卡锡时代一起入狱。这样的平行人物形象在华人华裔文学中并不多见。上述人物塑造是黄运基对美华文学传统的传承还是偏离?这对于族裔权利诉求是否具有象征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分析三部曲对美国华人历史的再现,并结合这种人物塑造分析唐人街叙事中的跨种族史观。

一、华人美国梦视域下作为移民历史镜像的唐人街

文学叙事和华人社区历史的关系几乎是唐人街叙事的一个共性,《异乡三部曲》同样如此。前两部以15岁的余念祖从中国到美国唐人街的经历为线索,他作为主要人物和主要叙事视角融合了经验自我和叙事自我,通过自我成长和认知拓展呈现唐人街的百年历史。《巨浪》中余念祖的观察视角主要发挥了连接作用,而改革开放之初从大陆来到唐人街的咏梅、成长于唐人街后陪伴丈夫徐风回国的刘珍、第三代华裔新女性胡小慧,以及非裔女性夏莲等人物成为叙事重点。这几部作品在美华文学历史上“以个人成长史的视角,以跨越巨大时间与空间的叙述把华人的美国梦追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⑧,在呈现人物的经历中追溯唐人街的历史。

唐人街作为族裔文化景观,见证了早期苦力华工追求梦想的历程,书写了他们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牺牲。十九世纪中后期“淘金热”背景下华人的大规模海外务工潮中,华工大多心怀财富梦想踏上漫长旅途。当年余念祖的祖父等两万余名劳工为了生计而来到美国务工,他们先后在矿山和太平洋铁路建筑工地

①李晖:《族裔历史的重构:加拿大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的唐人街叙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刘荒田:《序》,黄运基:《巨浪》,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③蒲若茜:《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④刘桂茹:《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第203页。

⑤袁荃:《〈献祭〉中唐人街的空间书写》,《外国文学》2020年第5期。

⑥熊国华:《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评黄运基长篇小说〈巨浪〉》,《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305页。

⑦刘桂茹:《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学术界》2008年第6期。

⑧默崎:《美华文学和“美国梦”叙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年,第111页。

挥汗洒泪。小说借余念祖之口将这种追求定义为“美国梦”：“梦寐以求的美丽的自由乐土，这就是美国。爷爷来过，爸爸来过，来寻找他们的美国梦。”^①忠义堂创始人余宗锐和陈裕明即是筑路华工悲壮历史的缩影：他们以肩挑手抬的原始方式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难题，用“鹤嘴锄开山洞，凿土钻石，筑隧道”^②，筑起了贯通美国大陆的铁路。华工的工资水平是筑路工人中最低的，他们却承担了最艰巨工段的施工任务。因为施工条件和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华工死在工地上：“不管是烈日寒夜，风吹雨淋，风雪冰冻，他们筚路蓝缕一英里一英里地铺设铁轨，凿筑了不知多少条隧道，最长的达一千六百英尺。……不少华工在筑路过程中惨死在崇山峻岭，沿途白骨累累，谁也无法确定他们的身世。”^③然而，华工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的磨难，华人的文化习俗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排挤华工的借口，华人的吃苦耐劳成为就业竞争中他族劳工迫害华工的理由。华工代表没能参加太平洋铁路竣工仪式，资方以为那些微薄的工资就可以将华工的贡献一笔勾销；100年以后的纪念仪式上，美国交通部官员盛赞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同样选择性地忽略了华工的贡献。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叙述者不禁质问道：“是部长先生你对历史的无知呢，还是你的种族歧视的心态在作祟？”^④三部曲中的唐人街叙事追溯的正是这个启于财富梦想而归于族裔现实的移民历史，在百年历史画卷中审视华人的“美国梦”。

唐人街正是华工为了应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排华潮”而开辟出的生存空间。中央太平洋铁路完工后不久，华工先辈就遭受了美国的制度性排挤。为了躲避迫害，余宗锐和陈裕明率领一众兄弟在旧金山建立了固定的聚居点：“当年我们受到白种人的欺负，生命朝不保夕，我们被迫挤在一个角落里，互相扶持，互相保护，像筑了一座无形的墙，防止白种人的欺负，这才使我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座墙就叫做唐人埠”。唐人街逐渐成为“海外华人寻找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时所追寻的那个具体的‘共同体’”^⑤，代表了华人共同的文化根基和政治诉求。

唐人街所经历的风雨投射出排华法案背景下美国生命政治主体对华工的多重规训，唐人街的逼仄具象化了华人被不断挤压的生存空间。在美国制度性排华的纵容之下，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沙地党徒跑到唐人街行凶，“像疯了似的到处点火，烧毁了好几家店铺，店里的人被浓烟迫出街外。沙地党徒见人就棒打枪杀……那天，有二十一个华人被沙地党徒缢死，被枪击死伤的不计其数”^⑦。即使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所有的暴徒还是被无罪释放。没有任何人为唐人街的劫难付出代价，就是因为在国家治理者眼里华人的生命轻如草芥。唐人街被限制在这个固定的区域内，随着人口的增加，狭小的空间内店铺鳞次栉比，街道房屋越来越拥挤。余念祖初到唐人街，看到的正是它的逼仄和压抑：“旧金山的唐人埠——华侨最集中的地方，是当年受白种人欺负，被迫挤在一起形成的狭小地方。都板街是华埠的中心街道，街道两旁尽是礼物店、杂货店、餐馆、鞋店、首饰店、药材铺、卖报摊……，从勃斯伸到布律威街。”^⑧非华人群体可能会将唐人街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视作“东方风情”，却忽略了它所遮蔽的问题：种族政治对华人生存空间的挤占，以及华人在追求美国梦时经历的挫折。这三部作品从族裔社区的形成演变投射美国国家机器对华工生命的钳制，从国家治理的视角下对华人的“美国梦”进行再审视。

这个审视是多维度进行的，其中家族历史书写和平民化人物塑造提供了较为典型的两个叙事维度。有学者指出了三部曲中人物较为突出的阶级特征，认为他们“大都出身贫寒，在家乡饱受压迫和欺凌，生活难以继，才被迫飘洋过海。他们到美国去是为了生存和温饱。”^⑨事实上，除了黄运基的三部曲之外，其他较为典型的唐人街书写也多以普通华人为主要书写对象，家族历史小说是较为重要的体裁。^⑩作者本人在《奔流》

①②③④⑦[美]黄运基：《狂潮》，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3页，第41页，第39页，第47页，第45页。

⑤⑧[美]黄运基：《奔流》，第42页，第29页。

⑥刘桂茹：《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学术界》2008年第6期。

⑨徐迺翔：《魂系中华、心连祖国的情结——评黄运基的〈奔流〉》，《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5期。

⑩除了黄运基的三部曲之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英语和华语文学中唐人街主题的作品大多如此，典型代表有郑蔼玲的《妾的女儿》和张翎的《金山》等，因为篇幅所限，此论题不再展开。

后记中强调了人物的平民化和这类经历在唐人街中的代表性：“奔流——是一部虚构的、也是写实的小说，因为在众多的人物中，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的朋友的生活经历。小说所描写的许多事件，都是美国华侨耳熟能详的。”^①小说中余念祖三代人的家族历史成为历史视阈下再审视华人美国梦的一个范例：余念祖的祖父是被卖到金山的“猪仔华工”^②，他在美国辛勤务工多年而后回乡娶妻生子，打算重新回到美国时却遭遇了排华法案无法入境；余念祖的父亲不得已冒用周姓华侨家的名额来到美国。余念祖刚一下船就被困在移民局的大楼里接受审查；他跟着父亲到雇主家里务工，看到父亲因为不小心把汤水撒到来宾身上而遭到了殴打。余家几代人的经历反映出华人移民史上几个重要的时期：契约华工阶段、排华法案期间，以及排华法案废除后的新移民阶段。普通华侨追求梦想的坎坷经历令人唏嘘，也正是因为小说人物具有平民特征，他们的“美国梦”历程才更加打动人心。

除了余念祖一家之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遭遇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激烈碰撞。这些人物大都带有平民取向，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并都在新近几十年中（尤其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陆续移居美国，这些人既不属技术移民或经济移民，也不属文化移民或精英移民，而是因为宗族、血缘、婚姻、劳务等关系而走出国门。”^③应该说，“草根取向”更加凸显了小说对华人美国梦的反思：这些人物虽然在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上有所差别，但他们都共同受到国家种族主义的规约，即便余锦堂和黎浩然等华人知识分子和胡丽华等企业主也不例外。绰号“众议长”的唐人街灵魂人物余锦棠原名汤翼，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在唐人街创办了《金门侨报》来宣传进步思想，但他在麦卡锡时期遭到审查而蒙冤入狱。新移民黎浩然来到唐人街同样遭遇了梦想的挫败：他曾经是抗日游击队的队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迫于老父亲的命令来到美国继承父业；他是余念祖成长中重要的领路人，但后来受到极左团体 3A 党的影响而趋向于激进，与唐人街上华人争取权利的斗争渐行渐远。胡丽华称自己的工厂为“血汗工厂”：“我们以低贱工资请来移民姐妹车衣，我们剥削了她们，我们也被中间商剥削，我们就像一个三文治，夹在中间，真正赚大钱的是成衣业的大老板”。^④小说在唐人街的全景画面中追溯几代华人追求梦想的历程，也呈现了不同行业华人共同面临的生命政治钳制。

二、作为华人家国情怀文化影像的唐人街

唐人街不仅在最初的构架上具有特定的族裔历史背景，并且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机制和文化模式，它在对华工和华工后代进行保护的同时，也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将华人和其他文化群体分割开来。唐人街叙事便充分再现了唐人街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包围之下这种矛盾的存在。

唐人街华人在价值观上表现出对于华人文化的高度认同。在美国排华历史以及二十世纪中期反共反中的“美国规则”下，唐人街华人不得不构建起特有的“唐人街规则”来维护华人族群的共同命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情谊和家国情怀正是重要的精神支撑。小说中忠义堂为代表的兄弟情谊就是华人共同价值的一种表现。忠义堂是华工的堂会组织，当年为了谋求华工的共同利益而成立于铁路工地；筑路工程结束后，堂主率领一众兄弟到唐人街定居下来，之后他们一直严格坚守堂规：“不嫖娼、不赌博、不醉酒、不吸烟。”^⑤这种传统美德使他们得以共同躲避风雨。老华侨赵子常身患重病，余锦堂把所有的积蓄都捐助出来为他就医提供帮助；忠义堂的成员筹集专门款项、沿着当年华工先辈的足迹，收集“死于瘴疠瘟疫和事故的华人‘开路先锋’遗落在路边的累累白骨”^⑥，并将他们运回中国，让他们魂归故土。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兄弟情谊表现为对华人移民史的整理，即通过复活华人先辈在历史中的形象，象征性地为他们“招魂”。小说中的历史学家、作家吴仲云，整理、写作了反映华人华侨百年历史的诗集《天使岛诗词》和《落地生根》，记录华工为美国发

①[美]黄运基：《奔流》，第 285 页。

②对早期苦力华工的一种贬低性称呼。

③陈涵平、吴奕琦：《简论美华文学中的“草根文群”》，《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

④⑤⑥[美]黄运基：《狂潮》，第 49-50 页，第 47 页，第 45 页。

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的先辈为美国这块土地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无论是建筑中央太平洋铁路，还是开拓处女地，对美国的农业、渔业、早期的手工业，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们的先辈所受到的待遇，却是令人发指的。……直到今天，我们华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逐渐冲破压在我们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多的华人积极参政议政”。^① 余念祖和吴仲云这两个人物是作者黄运基的代言人，他们是华人移民历史的记录者，共同承担叙事任务，主张华人华裔的合法权利。

唐人街叙事中的人物，尤其是华侨，表现出对于中国的深切关注和浓重的热爱。小说开始时是1948年，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革。黎浩然、李海峰等新移民和余锦棠等老华侨都对祖国的形势高度关切：“绝大多数华侨都心向祖国，希望祖国富强起来，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争取华人在美国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还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华人团结合作、互爱互助的根本保证”。^② 保守势力在美国反共气候之下组织“反共会”和“护国团”，在唐人街进行政治鼓动，笼络对国内形势不甚了解的华人，雇佣地痞流氓对进步活动进行骚扰破坏。余锦棠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给唐人街带来的挑战：“中国人民经过逾一个世纪的奋战，前仆后继，终于把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一个新的中国很快就会出现了……新与旧思想的斗争，在美国华人社区将会显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美国政府对倾向新中国的华人，将会进行骚扰，甚至进行形形色色的迫害，华人社区将进入一个多事之秋”。^③ 黎浩然等进步人士勇敢地与保守势力开展斗争，他们深入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甚至冒着失去工作和生计的危险、勇敢质疑华侨中学历史课本中涉及抗日战争的不客观内容。学者肯定了小说中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情感：“海外华人的追求光明进步的感情与祖国人民是相通的。华人们深知，在这个大震荡、大裂变的时代，海外华人虽然各有各的打算，但要真正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应该有所作为。”^④ 这种情感本质上就是“爱国情怀”，它“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贯穿在每一个情节和每一个人物身上，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极高的社会价值和很强的艺术魅力。”^⑤ 这些中华文化要素为唐人街居民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情感认同，这种认同与华人的“美国梦”所昭示的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共同存在，由此就构成了唐人街上的双重文化认同。

在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产主义逆流中，首先受到生命政治主体权力质疑的正是兄弟情谊、家国情怀等华人传统。余念祖因为参加青联而遭到“非美”调查，他在法庭慷慨陈词，承认青联会员与中国的情感联系，因为会员：“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青年人，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山山水水、甚至一片泥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⑥ 可是，这种联系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所无法容忍的，最终青联被认作“亲中”“亲共”组织，余念祖也被驱逐出军队，未能获得退伍军人助学金的资助。《金門侨报》因为刊登中资银行信息而遭到封禁，余锦棠被美国检方指控为“与敌通商”。这场政治运作意在震慑唐人街上的华人，逼迫他们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华人汇款回家乡赡养亲人这一天经地义的亲情被残酷地政治化了，汇款者顿时被‘与敌通商’的莫须有的罪名压在头上”。^⑦ 可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被视为对美国的不忠诚，遭到权力主体的压制，这与亨廷顿对拉丁裔美国人“双重认同”^⑧的批判如出一辙，都属于美国国家权力对族裔群体实施的规训。

唐人街对中华文化较为普遍的认同为华人提供精神支持，不过这种认同也反映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相对孤立状态。余荣祖便代表了过度依赖这种认同感而被“唐人街”这堵无形的高墙所束缚的华人移民。他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但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他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⑨，把大家争取权利的事情视为

①[美]黄运基：《巨浪》，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②③⑨[美]黄运基：《奔流》，第114页，第188页，第61页。

④戴翊：《新视角、新主题和新的艺术形象——读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异乡曲〉第一部〈奔流〉》，《上海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⑤徐迺翔：《魂系中华、心连祖国的情结——评黄运基的〈奔流〉》，第151页。

⑥⑦[美]黄运基：《狂潮》，第106页，第61页。

⑧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自找麻烦”。他的这种心态在唐人街的政治风暴中尤其明显。他对于儿子和余锦堂等人的交往心存顾虑：他一方面顾念余锦堂一直以来的帮助，当初他从军队退伍回到唐人街，正是余锦堂借钱给他，他才能够回乡将儿子念祖带到美国；另一方面，他明白余锦堂遇到的麻烦是美国反华政治意图的体现，担心儿子的思想会变得激进，害怕自己受到牵连。余荣祖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固化的“唐人街思维”，它生发于弱势个体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是其保守狭隘的立场最终使个体承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父子在“坦白运动”中受到的迫害便是证明。

三、“异乡”协商：超越唐人街思维的族裔命运共同体

唐人街的人文风貌固然具有中华文化特色，但它毕竟是处于“异乡”的文化空间——唐人街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及中美社会与时政的综合体。黄运基在其创办的《美华文化人报》^①的创刊词中提出，华侨文化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它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脐带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华裔，他（她）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她）们在思想感情上、在言行举止上虽然与先辈们迥然相异，但却没有数典忘祖，他（她）们也在觅祖寻根。”^②就是说，华侨文化是生发于“异乡”的中华文化支脉，它有着对于“家国”和“异乡”的双重认同，即华人同中华文化的情感联系，以及华人文化同美国其他文化分支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黄运基将其命名为“异乡三部曲”的原因之一。它在书写唐人街内部中国传统家国观念的同时，还通过余念祖等新华人移民形象的塑造，呈现如何超越唐人街那堵无形的墙，使华人能够在“异乡”更好地生存。

唐人街的街景和人文景观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文化共存，诸如唐人街和黑人社区比邻的地理位置、余念祖和黑人男孩占美的友谊、余念祖和白人女孩茱莉的爱情。忠义堂大厅的陈设就是一个文化共存的阈限空间：“大厅进口处靠左的墙壁中央挂着孙中山的画像，画像顶上有一横匾：天下为公。画像的右方和左方则有一对竖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厅还挂有蒋介石的画像。在孙中山和蒋介石画像的两旁分别挂着美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③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唐人街上的两派势力还在是否举办庆祝仪式这一问题上角力，所以忠义堂尚未撤下旧政权的标志，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以及《少年中国晨报》无疑是中国海峡两岸时政的反映；桌椅、茶壶、绿植的陈设带有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两面旗子以及《世界日报》《中西报》则是两个世界以及中西两种文化在唐人街这一场域中的呈现。在这样的唐人街上，主要人物余念祖需要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平衡协商：在唐人街内部有父亲代表的顺从怯懦和余锦棠所代表的自尊勇敢；在唐人街外部有华人文化和非华人文化的共存。他正是在这几种互补共存的文化空间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进步的政治意识。相比于父亲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华人移民与美国其他族裔群体的“不同”，余念祖没有固守华人传统，而是对其他文化表现出积极的接纳。他和白人女孩朱莉、黑人男孩占美成为朋友，逐渐开放性地对待多元的美国文化，以同理心看待其他弱势群体的生存关切，最终形成了族裔共同体意识。余念祖作为新移民中的一员，代表了唐人街这个“家国”和“异乡”阈限空间内超越“唐人街思维”的希望。

美华文学不乏个性鲜明的非华人华裔人物，但是并不多见余念祖和占美这样的兄弟情谊。余念祖初到美国，看到了唐人街和毗邻黑人区同样的贫穷破败：“整个地区的楼房，像经过一场可怕的天灾一样，到处破破烂烂，百孔千疮，街道污秽不堪。……所有的商店都装上了大铁闸，人们置身其中，像走进了一座大监狱，它使人马上产生一种恐惧。”^④余念祖到占美家做客时受到热情的款待，但是他也看到了他们一家的窘境和

^①报纸为美华文学双月刊，创办于1995年2月1日，黄运基、王性初、老南是最早的发起人，1998年6月改版为《美华文学》，成为美国华人文艺界协会的刊物。参见黄运基：《与老南共事的日子》，《美华文学》2005年春季号，总第57期。<http://www.meihuawenxue.net/meihua/57/huangyunji-laonan.htm>；参见王列耀、颜敏等著：《寻找新的学术空间——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4-186页。

^②转引自王列耀、颜敏等著：《寻找新的学术空间——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第185页。

^③[美]黄运基：《狂潮》，第49页。

^④[美]黄运基：《奔流》，第86页。

黑人社区的普遍困顿:占美的姐姐嘉兰被迫卖身做娼妓来养活一家人;黑人社区失业高,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透露出绝望和愤怒,似乎这是他们绝望之中所能够表达的唯一情绪。余念祖逐渐意识到唐人街并不是殖民主义和美国国家种族主义的唯一受害者,他开始思考唐人街狭窄局促和非裔社区贫穷混乱的根源,并试图参与到提升少数族裔社区境况的斗争中。余念祖和占美之间不只是跨种族的兄弟情谊,他们互为“影子人物”,在彼此的形象和生活中照见自己,共同获得成长。两人的跨种族友谊连接起唐人街的进步和黑人的解放运动。余念祖在占美的黑人朋友的保护下,替唯一敢于售卖《金门侨报》的黄老伯看守报亭,庆祝新中国成立而印发的专刊得以传播出去。余念祖也和占美结伴去往南方参加民权运动,并肩参加了向蒙马利哥进发的游行。他们在南方搭乘公共汽车时遭到歧视,被司机喝令坐到后面。二人据理力争进行反击,勇敢对抗种族隔离的不公。这种超越族裔阈限的兄弟情谊既反映出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在《基督教慈悲之典范》(*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1630)中所倡导的兄弟情谊(bonds of brotherly affection)^①,也践行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在《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中所说的“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②。余念祖和占美的友谊是唐人街传统观念中华人兄弟情谊的跨种族延伸,两个人的同盟则是跨族裔共同体的缩影。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小说表示,华人想要在美国这个“异乡”生存下去,就必须摒弃狭隘的唐人街思维,将华人传统的家国观念扩而广之,同其他族裔群体形成合力,才可能打破限制唐人街发展的“玻璃天花板”。

相较于诸多描写新一代华人走出唐人街的文学作品,《异乡三部曲》通过这几个核心人物的塑造,动态呈现唐人街在传统的家国情怀和兄弟情谊基础上进行的自我革新。余念祖不再像父亲那样逆来顺受、被动地躲避危险,而是迎头面对挑战、勇敢主张权利。他参加读书会,利用在图书室的做志愿服务的机会读书看报、密切关注祖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还参与“青年之家”的“文艺欣赏组”“戏剧组”“歌舞组”和“英文辅导组”,积极接纳唐人街以外的世界。他从余锦堂那里学到了批判意识和斗争智慧。余锦棠机智地应对英文《论坛报》记者,对于美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进行冷静的批判:“美国是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说句老实话,我们来美国之前,是深信不疑的,可到了美国之后,现实告诉我们,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民主权利、自由权利和人权通通都被剥夺了!”^③他还逐渐学会使用主流群体接受的话语模式展开斗争,这在他的两场法庭辩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他绝不甘心再像他爷爷和他父亲这一辈那样生活了。他对自己说,我要留在华人社区,而思想必须突破围住这个社区。”^④他不甘于接受权力主体的钳制,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利,经过多年漫长的诉讼,他终于获胜,军队为他补发了“荣誉退伍证”和退伍军人助学金,他得以进入州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余念祖不再像父亲那样屈辱地生活,而是要主张自己在美国的权利,打破限制华人发展的“玻璃天花板”。

不断提升的政治觉悟令余念祖认识到,华人的梦想之所以受到如此挫折,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权力机制运作,因而华人必须改变生存策略、与兄弟族群组建斗争者共同体,借助于合力才能争取更多的权利。华人走出作为家国象征的唐人街、从心理上接受“异乡”的其他族群,才能得到“异乡”的接纳并将其变成“家乡”。第三部中,胡小慧和占美的妻子夏莲联合组织文化项目,一起参加竞选并双双当选为市议员。英汉双语的“社区和谐”^⑤宣传口号,旧金山湾区商店玻璃窗内夏莲的照片和“中英双语文宣”^⑥,《金门侨报》的中英文双语版,以及余念祖早年白人女友茱莉给《金门侨报》的读者来信,都表达了三部曲在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具有超越族裔社区地理文化阈限的象征意义,无论这个社区是唐人街、非裔美国人社区还是欧裔白人社区。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小说的颠覆意义还不仅在于刻画出了与传统白人意念相对立的历史文化影像,亦在于

①<https://history.hanover.edu/texts/winthmod.html>, 2004年2月19日。

②<https://www.npr.org/2010/01/18/122701268/i-have-a-dream-speech-in-its-entirety>, 2004年2月19日。

③[美]黄运基:《奔流》,第74页。

④[美]黄运基:《狂潮》,第123页。

⑤⑥[美]黄运基:《巨浪》,第241页,第242页。

进一步从人类共同本性出发,对种族间应有之关系,作了一次充满理想色彩的重构”。^① 这种重构是第三部的主旋律,也是三部曲最终的价值取向,吴仲云的诗集《落地生根》更是黄运基唐人街叙事的诗性表达:它追溯美国华人从“走进唐人街”进行自我保护、到“走出唐人街”超越狭隘思维的生存路线,探索如何与其他群体建立跨族裔共同体,从而实现“家国”和“异乡”的协商。

结语

黄运基的《异乡三部曲》描绘了旧金山唐人街的人文地理风貌,通过人物的个体经验投射出百年华人移民历史,呈现了“唐人街”的多重文化镜像:唐人街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投射;它还是文化角力的阈限之地;以兄弟情谊、家国情怀为代表的华人文化是唐人街族裔人文生态的核心要素,但这种家国意识的特定意义取决于唐人街这一“异乡”场域。三部曲在展现唐人街百年间人文地理风貌变迁的同时,还通过唐人街新一代华人的政治成长书写华人如何克服狭隘的唐人街思维、走出心理上的“唐人街”。只有在“家国”和“异乡”的协商之间找到平衡点,华人才能够在族裔共同体的合力之下谋求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Chinatown Narrative in Huang Yunji's Foreign-land Trilogy and the “Homeland” and “Foreign Land” Negotiation

LI Bao-jie¹, HU Jun-hui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Zibo International Academy at Hi-tech Zone, Zibo 255035, China)

Abstract: Foreign-land Trilogy by Chinese-American writer Huang Yunji focuses on the landscape of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present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journe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over half a century, and thereafter re-examining historiographically the American dream for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hinatown narrative,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Chinatown, integrate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portraying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atown represented by Chinese patriotism and brotherhood. The novels not only highlight the ethnic cultural traits but also emphasize the need for Chinese immigrants to overcome the “Chinatown mentality” and break free from the psychological confinements of Chinatown. Through the political growth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Chinatown, and the shared experiences of the protagonist and his life-long African-American friend, the trilogy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for Chinese immigrants to reconcile between Chinatown that symbolizes their “homeland” and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that represent the “foreign land” so that they can truly realize their American dream with the help of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ethnic unity.

Key Words: Huang Yunji, Foreign-land Trilogy, Chinatown narrative, ethnic unity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叶中强:《历史的另类文本——论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奔流〉》,《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